

土耳其政党政治研究

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
的土耳其“民主模式”

王 林 聪

内容提要 正义与发展党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背景，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就该党性质而论不属于伊斯兰主义政党。正发党执政以来奉行温和、务实的政策，以“民主保守党”自居，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在宗教与世俗间寻求平衡，在不改变国家政权世俗性质的前提下，竭力维护伊斯兰文化传统和习俗，强调伊斯兰价值观的重要性。正发党主导下的民主模式对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有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宗教与世俗间的较量复杂多变又决定了这种民主模式内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关键词 土耳其 正义与发展党 民主模式

作者简介 王林聪，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社会与文化研究室主任（北京 100007）。

在当今伊斯兰世界，土耳其政治现代化道路所展现的世俗化、民主化范式一直是很引人关注又颇受争议的。民主实践在土耳其几经挫折，既面临着代表世俗力量的军人集团的压力，又受到伊斯兰主义势力的严峻挑战，宗教、世俗间的较量错综复杂，持续不断，直接影响着土耳其的政治发展道路。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们对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实践深感疑惑：脱胎于繁荣党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AKP”，下称“正发党”）可否被视为伊斯兰主义政党在新世纪的延续？换言之，正发党就其性质而论是否属于伊斯兰主义政党，其执政后的温和倾向究竟是权宜之计，还是战略选择？正发党执政以来的民主实践正在建构一种新模式，它对土耳其乃至中东地区都具有重要影响。

正发党的崛起及其社会基础

2002 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选举成为正发党崛起的标志。同年 11 月，成立仅有一年多的正发党（2001 年 8 月 14 日宣告建党）在大国民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并单独执政。该党一举夺得 1 080.45 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 46.5%，共和人民党获得 19.4% 的选票。根据得票率，正发党拥有 365 个议

席，占议席总数（全部席位共有 550 席）的 66.4%，共和人民党拥有 177 席，占议席总数的 32.2%。¹ 继而，在 2004 年的地方选举中，正发党得票 1 344.7 万张，相当于其他各政党得票数的总和（共和人民党得票 588.3 万张，民族主义行动党 337.2 万张，正确道路党 321.6 万张，祖国党 80.8 万张）。^④ 2007 年 7 月，土耳其举行大国民议会选举，正发党获选票 1 564.13 万张，占全部选票的 46.5%，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分别获得 20.9% 和 14.3% 的选票。根据得票率，正发党拥有 341 个议席，占议席总数的 61.5%，共和人民党拥有 112 席，占议席总数的 20.2%；民族主义行动党 71 席，占议席总数的 13.5%。^⑤ 选举结果显示，正发党所获选票超出 2002 年 11 月选举所获选票的 12%，继续单独组阁。

正发党的崛起绝非偶然，而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土耳其经济自由化与政治伊斯兰复兴相互作用的结果。图格特·厄扎尔总理执政时期（1983~1989 年），一方面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发展私营经济，鼓励自由竞争，推动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加强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力图通过扶持正常的宗教活动，抵制宗教极端主义倾向。在厄扎尔对宗教更为宽容的背景下，各种各样的伊斯兰组织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允许它们资助私立学校、大学的建设。伊斯兰主义组织相继在报纸、电视等重要媒体上占有地位。1993 年首家具有明显宗教倾向的电视频道出现，为宣传伊斯兰教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从而大大扩展了伊斯兰主义者的社会影响。厄扎尔本人不仅是一位有西方背景、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的经济问题专家——享有“经济设计师”之称，而且是纳克什班迪教团的支持者。他在 1983 年组建祖国党之前，就曾与埃尔巴坎的民族救国党有联系。身居总理要职后，又与伊斯兰教界人士有交往，与伊斯兰教思想家葛兰^{1/4} 关系密切，后者被视为“穆斯林自由主义宣教士”。葛兰在宣讲古兰经的同时，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宽容和共存，从而吸引了许多工程师、安纳托利亚新资产阶级、学者，以及其他职业群体成员。厄扎尔总理力图通过葛兰的宣教活动来抵制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影响。正是在上层的支持下，葛兰运动经历了 1983~1997 年被称之为黄金发展时期，逐渐在教育、媒体、乃至市场等领域打开局面，在土耳其社会中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1/2} 厄扎尔总理也因此被视为“跨越于教、俗分界线”^{1/3} 的重要人物。更重要的是，厄扎尔执政时期，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国营企业私有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受到削弱，私人资本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个新群体——具有深厚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它不仅支持自由经济政策，减少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作用，而且要求更大程度上的宗教自由。20 世纪 90 年代，该阶层曾是繁荣党的支持者，今天则是正发党的铁杆支持者之一。^⑧

正发党的迅速崛起还源于 1998 年、2001 年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致使土耳其陷入严重困境，人心思变，民众对政坛腐败强烈不满，渴望早日摆脱危机，因此寄希望于新面孔——正发党。而该党在几次选举中均取得压倒性胜利，表明它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其支持者主要来自较为贫穷和欠发达城市，且得到了安纳托利亚东南部众多库尔德人的支持。例如，通过 2006 年 3 月对不同政党支持者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地位调查显示：对正发党支持者中具有初级教育水平（初中）的占 63.4%、中等教育水平（高中）的占 26.9%、高等教育水平（大学或大学以上）的仅占 9.7%，对其他政党支持者中分别为 46.8%、36.3% 和 17%（其中 2002 年对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分别占 37.3%、40.1% 和

¹ M. Hakan Yavuz *Secularism and Muslim Democracy in Turk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54.

^④ *Turkish Statistical Indicators 1923–2004*, 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 p. 143.

^⑤ M. Hakan Yavuz *op. cit.*, p. 254.

^{1/4} 葛兰（Fethullah Gülen 1941 年~），伊斯兰教思想家，生于土耳其东安纳托利亚省考拉克，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伊斯兰复兴浪潮——“葛兰运动”的发起人。

^{1/2} See M. Hakan Yavuz *Islamic Political Identity in Turk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82–184.

^{1/3} Angel Rabasa F. Stephen Larrabee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8, pp. 39–40.

^⑧ See *ibid.*, pp. 38–39.

22.6%)。同时,对正发党支持者中有高级职务的仅占1.9%、有中低工作的占42.8%,家庭妇女、退休者及学生占55.3%,对其他政党支持者分别为4.5%、47.1%和48.4%。¹相比之下,对正发党的支持者绝大多数属于社会下层民众——这些人是决定选举胜负的关键群体。

权宜之计,还是战略选择?

正发党执政后,究竟要奉行何种治国方略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早在正发党2002年参选前后,许多西方媒体将该党定性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主义政党”。数年后,当该党采取“哥本哈根标准”,又在土耳其议会通过一系列改革方案后,它又被描述成“一个致力于改革的伊斯兰政党”。2007年大选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正发党是“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党”^④。然而,正发党则自称是“保守民主党”。正发党的思想家阿克多安更是否认该党与政治伊斯兰之间有联系,他甚至反对该党使用“穆斯林民主党”这一标签。^⑤

众所周知,正发党的前身是遭取缔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繁荣党成立于1983年7月,有明显的宗教和民族意识,反对土耳其现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制度,主张建立伊斯兰式的社会公正秩序;反对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取消银行利息,建立伊斯兰统一市场和货币;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土耳其保持北约成员国地位,不赞成土耳其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繁荣党曾在1995年大选中以21.4%的得票率赢得了158个席位,一跃成为第一大党,引起了土耳其政坛的震动。1996年1月,繁荣党领袖埃尔巴坎组阁,并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史上首个上台执政的亲伊斯兰政党。这期间,埃尔巴坎曾邀请几位被禁止的教团领袖到总理府出席开斋宴。这些挑衅性举动最终导致军方发动“软政变”,迫使埃尔巴坎总理辞职。1998年1月,宪法法院裁决取缔繁荣党。此后,繁荣党改称美德党(Virtue Party, FP)。2001年6月,美德党被取缔,该党中的传统派组成幸福党(Felicity Party, SP),改革派则另组阵营——正义与发展党,核心成员包括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阿卜杜勒·居尔、比赖特·阿里萨、阿卜杜勒拉蒂夫·塞奈尔等。在正发党的省属机构中,有41%的党员曾参加过其他政党(其中38.7%曾为繁荣党成员,16%为美德党,15.3%为祖国党,8.7%为正确道路党,6.4%为民族主义行动党成员),尤其是繁荣党。^⑥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发党脱胎于繁荣党和美德党。

但是,执政后的正发党在其理念上已超越繁荣党和美德党,且根据时代的变化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形成了与埃尔巴坎等前任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治国方略(见第23页表)。

通过对繁荣党、美德党、正发党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具有传承关系的3个政党之间有明显差别。正发党有浓厚的伊斯兰背景,但它已不属于伊斯兰政党。

1. 正发党追求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也没有把伊斯兰价值观作为国家认同的唯一标准。正如尤他大学政治学博士哈坎·亚犹兹所称,正发党并未追求对土耳其国家和社会进行伊斯兰改造,也不是寻求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实施伊斯兰教法,相反,它追求在议会中拥有更多席位,以便强化其权力。^⑦

2. 正发党之所以选择温和、务实的政策,乃是吸取繁荣党、美德党接连遭禁的深刻教训。人们可以清晰可见正发党领导人的这种转变:十多年前,时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埃尔多安曾发表过一些

¹ Ümit Cizre, *Secular and Islamic Politics in Turkey: The Making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Routledge, 2008, pp. 213–214, pp. 218–219.

^④ *The Economist*, August 2, 2007.

^⑤ See M. Hakan Yavuz, op. cit., p. 2.

^⑥ Ümit Cizre, op. cit., p. 205.

^⑦ See M. Hakan Yavuz, op. cit., p. 8.

言论：“感谢真主，我赞成沙利亚”；“一个人不能既是世俗主义者，又是穆斯林”；“对我们而言，民主就是末日的一种方式。”¹ 可以说，此时的埃尔多安是典型的伊斯兰主义倡导者，他还以诸如诗朗诵等方式挑战国家世俗基础，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国家安全法庭判处他十个月监禁，剥夺他 2003 年 1 月前参政的权利。但是，执政后的 2003 年 1 月 30 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则宣称：民主不是社会中特殊人群所独有的。它更是现代生活的需要。^④ 他还说：“我是一个穆斯林……信奉安拉是我的义务；但是，现在我努力把它同我的政治生活分开，使它保持私域性质……一个政党不能有一个宗教，只有个人能够这样……宗教是至高无上的，它不能被政治所利用。”^(四) 埃尔多安还不止一次地宣布：“我已经变了”，“正义与发展党也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发党及其领导人的这种转变不单纯是权宜之计，且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出于巩固政权需要而进行的一种战略调整与选择。

繁荣党、美德党与正发党的比较

	繁荣党	美德党	正发党
政治风格	强硬、自信，有一定的好斗性		温和、保守，强调对话协商，自我标榜为“保守民主党”
关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强调政府在资源再分配和创造社会公平中的重要性，重视政府在私有化过程中的作用	不强调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视私有化为克服经济不平等的路径	强调市场经济，重视外国投资，支持私有化进程，不赞成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民主化	强调公共利益，重视公共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关注个体而非个人主义。缺乏多元主义理念，力图通过伊斯兰教达到政治整合的目标	强调个人权利，关注人权，支持人权状况的改善，视宗教自由为人权的核心内容	主张通过改革扩大公民权利，改善人权，发展公民社会，提倡精英民主和“多数决”。在加入欧盟进程中包含了一整套民主化方案
民族主义	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并根据伊斯兰教和奥斯曼传统界定土耳其人，视土耳其为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根据民族成分状况重新界定土耳其人，承认库尔德民族。在涉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方面，尚无明确主张
宗教、道德观念	强调为创造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将伊斯兰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相结合。未给世俗价值观留有空间	重视道德观念和准则，强调宗教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排除世俗人权话语	强调宗教价值观的重要性，注重以道德观念、准则作为社会的一种规范。同时利用人权话语创造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强调个人的责任性，把宗教自由作为民主化项目的组成部分
中央与地方关系	强调中央政府在推动社会正义和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主张地方分权，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	主张地方分权，重视地方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
对外政策倾向	有很强的反西方、反欧盟倾向，但该党的立场逐渐趋缓。坚决反对以色列。支持与伊斯兰世界的密切交往，并作为正发党外交政策的核心	主张积极、平衡外交，力图通过亲西方、亲欧盟的政策来扩大该党的合法性。未将伊斯兰认同为对外交往中的一种资源	有很强的亲西方倾向，并致力于推动加入欧盟，以此打消人们对正发党的指责（伊斯兰主义）、推进民主，削弱军队权力等。在对外交往中，不强调伊斯兰认同

Source M. Hakan Yavuz op. cit., pp 73– 74 Ziya Öni, *Globalization and party transformation: Turkey’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perspective* p 9.

¹ M. Hakan Yavuz op. cit., p. 4.
^④ See Meliha Benli Altunşik “The Turkish Model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rab Studies Quarterly*, No 1– 2 Winter / Spring 2005 p. 56.
^(四) Deborah Sontag “The Erdogan Experiment”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1, 2003.

3. 仅凭现阶段正发党的某些施政内容不能确认该党具有宗教性质。正发党执政以来,提出了颇有争议的提案主要有通奸法、限酒令和取消禁止女大学生戴头巾法令等。由于国内世俗势力和欧盟的反对,政府自动放弃了通奸法提案。而在执政党掌控的一些城市,当局的确在一些街巷实施了禁酒令,关闭了酒吧。废除女大学生戴头巾禁令虽经议会通过,却被宪法法院否决。事实上,凭借这3个法案也不能断定正发党属于宗教政党,更不用说伊斯兰主义政党了。因为土耳其绝大多数是穆斯林,特别是东南部贫困地区的穆斯林更虔诚,他们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俗。这3个法案反映出他们的心声。从正发党至今公布的政治纲领和进行的政治实践来看,它至多是一个试图维护伊斯兰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政党。当然,在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看来,正发党有某种“潜在图谋”——一个将土耳其变成伊斯兰共和国的秘密议程。对于该党掌控议会推动多项触及世俗底线的提案,世俗集团更是忧心忡忡。2006年3月,埃尔多安总理企图任命一家特殊金融机构(1984年3月按照伊斯兰法建立的无息银行)总裁比约克迪兹担任中央银行行长,引起了巨大震动,最终以总统塞泽尔行使否决权才将此事平息。2007年出现了围绕总统候选人提名双方的斗争白热化,打出的标语是“不要沙利亚!”这再次见证了土耳其社会的鸿沟裂痕。

正发党主导下的“民主模式”及其内涵

正发党执政以来进行的民主实践卓有成效。正发党奉行温和、务实的政策,在宗教与世俗间寻求平衡:强调伊斯兰价值观,同时又坚持世俗化方向 and 政教分离原则,淡化宗教色彩,将该党定位为“民主保守党”,其内外政策的主张与世俗政党日趋相同,力求得到军方和世俗势力的认可。为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正发党采取措施,注重保护弱势群体,关注贫困问题,解决广大中下层民众面临的困难。埃尔多安当政以来,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社会保障和农业部门的改革,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整顿金融市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鼓励出口、抑制通货膨胀,取得了显著成效,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正发党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旨在符合加入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政治公开性和建立责任政府,加快民主化进程。由此形成了正发党主导下的“民主模式”。

埃尔多安总理曾将这种模式概括为“保守民主”。2004年1月,埃尔多安访问华盛顿并在发表演说时强调:“我们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以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方式着手于一种新理念(保守民主)……土耳其社会渴望采取一种不反对传统的现代性理念……一种能够理解并重视精神意义的理性主义……”。保守民主就是对土耳其民众渴望的一种回答。”¹正发党同时将自己界定为保守的民主政党,声称“有点像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不仅接受世俗主义,而且将宗教视为私人事务。^④居尔总统曾直言:“我们是一个保守的欧洲政党”,借以说明正发党是一个像西欧基督教民主党那样以捍卫土耳其公民文化传统为己任的民主保守党。

这种民主模式的最重要内涵是:奉行在尊重宗教自由前提下的世俗主义和民主化,并且将宗教自由作为民主化的重要内容。按照有些学者的看法,当今土耳其社会存在着3种世俗主义主张^⑤:彻底的世俗主义;保守的土耳其穆斯林所理解的世俗主义;以伊斯坦布尔商业精英、一些政治家,以及阿拉维社团所倡导的世俗主义。第一种观点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世俗化是一个必经阶段,否认伊斯兰教在民族认同和公共道德构建中的建设性作用。第二种主张是将伊斯兰教视为土耳其认同和道德构建的最重要资源,国家应鼓励并推动宗教教育,加强宗教道德建设。第三种主张则着重强调宗教与政治分离。而正发党所倡导的世俗主义不排斥宗教,相反,它赋予人们以信仰或不

¹ Sultan Tepe “Turkey’s AKP: A Model ‘Muslim – Democratic’ Par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6 No 3, July 2005, p. 76.

^④ See Meliha Benli Altunisiik op. cit., p. 50.

^⑤ See M. Hakan Yavuz op. cit., pp. 153 – 158.

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和组织生活。埃尔多安指出：“世俗主义就其概念而言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是国家的构建不应当根据宗教法律来实施，另一方面是国家应保持中立，给予所有信仰者同等待遇，并保证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¹

显然，这种民主模式着眼于土耳其社会现实，尤其迎合了许许多多虔诚穆斯林的基本诉求。众所周知，宗教与世俗间的斗争贯穿于土耳其现代社会，在诸如现代国家的构建、宗教地位等关键问题上的对立与分歧依然严峻，国家认同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土耳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近期关于土耳其身份认同问题的调查就能窥其一斑。根据土耳其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the Turkish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Foundation）在土耳其 23 个省进行的一项民众认同调查反映，土耳其人的首要认同情况是：认为自己首先是穆斯林的占 44.6%，分别高于第一认同是土耳其人（占 19.4%）、土耳其共和国公民（29.9%）和库尔德人（2.7%）。^④由此可见，在身份认同方面，土耳其民众对自身是穆斯林的意识仍然很强，显示出伊斯兰教在民众中有广泛影响。土耳其的这种社会特性也迫使许多世俗主义当政者调整其政策。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俗性大党——共和人民党在其长期坚守的反对戴头巾解禁问题上作出了妥协。2008 年 11 月 25 日，该党主席拜亚尔宣称：“戴头巾不应被视为反对国家的标志，同样，任何人戴头巾的行为都不该被赋予一种政治符号。因此，人们无权因为他人穿戴什么而遭到歧视。”^④更重要的是，土耳其的“民主模式”赞成全球化，顺应全球化潮流，并推动土耳其尽快加入欧盟。同时，此模式使土耳其创造了最快的经济增长率——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在正发党领导下增长了近 50%，通货膨胀率降至个位数。于是，正发党主导的土耳其“民主模式”吸引了许多效仿者——约旦、摩洛哥、伊朗等国，在这些国家，都出现了正义与发展党组织。在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还在选举中获胜。可以说，土耳其正发党的民主实践在中东地区产生了连锁效应。

无疑，正发党正在进行的“民主模式”是一项重大探索性实践，还存在着明显缺陷。首先，“保守民主”概念本身并不能成为正发党的指导思想体系，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正如政治学家艾哈迈德·耶迪兹所说，正发党的“保守民主”不是为了寻求该党的一种指导方针，而是作为打消外界、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顾虑，同样也是对内消除世俗主义者的疑虑。^⅔其次，围绕宗教与世俗间的斗争导致土耳其社会内部的裂痕不断加深，制约着民主发展水平。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杂志 2008 年民主指数^⅕评价体系，土耳其仍被列为“混合型政体”（介于民主与独裁之间），在受调查的 167 个国家和地区中，土耳其列居第 87 名，得分为 5.69，略高于中东地区平均得分的 3.54。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土耳其所面临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总之，正发党塑造的“民主模式”尚在形成中，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已经在中东地区产生“连锁效应”。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并摆在了人们面前：当伊斯兰主义逐渐转向温和、务实，且通过正常渠道参与政治发展进程时，权威政权究竟如何应对？拒绝、限制还是包容、吸纳？这成为考验现政权的核心议题。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安春英）

¹ M. Hakan Yavuz op. cit., p. 159

^④ Angel Rabasa F. Stephen Larnabee op. cit., p. 23.

^④ *Today's Zaman*, November 25, 2008.

^⅔ See M. Hakan Yavuz op. cit., p. 89.

^⅕ 民主指数是英国《经济学家》机构从选举程序、政府效能、政治参与、政治文化状况和公民自由等 5 个方面来调查评价某国民主发展水平的数量指标体系。按得分情况，通常区分为：充分民主政体、有缺陷民主政体、介于民主与独裁间的混合型政体、独裁政体等 4 个等级，其分值区间分别为：10~8 分、7.9~6 分、5.9~4 分、3.9~0 分，得分值越高，表明越接近充分民主政体；反之，得分值越低，表明越接近绝对独裁政体。2008 年，该机构对全球 167 个国家和地区调查统计显示，充分民主政体有 30 个、有缺陷民主政体 50 个、混合政体 36 个，独裁政体 51 个，分别占调查对象国的 18%、29.9%、21.6% 和 30.5%。See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Index of Democracy 2008”, <http://www.eiu.com/democracy/index2008>.

The Fourth Democratic Election in South Africa A Test for Constitutional System

Yang Lihua

pp. 5– 12

The fourth election after eliminating the Apartheid system in April 2009 is a test for the new constitutional system run for 15 years in South Africa. Due to the split derived from the power struggle within the ruling party and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ver South African economy have brought uncertainty to the election, the voters have focused more on futur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South Africa. The result of the general election shows that

the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has its sound ground. The various policy debates all over the country during the election are kinds of collective reflection and exploration of South African development road, which makes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South African development clearer. The Zuma government is under great pressure of meeting promises and is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ing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from the opposition parties. Anyway, a 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going well can be expected.

The Islamic Retribution Theory and Its A likeness with Chinese Culture

Liu Yueqin

pp. 13– 19

Cultural harmony exists objectively, the evidence of which can b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slamic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Many cultures including the Chinese culture have a wide recognition on the retribution theory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gods, society and human being themselves, which is the most practiced and commonly used religious theory, and is also the essence of human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philosophy of life.

A nation's religion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its national culture, which is why it is important to interpret a society from the angle of religion. Any cultures existing are rooted in the rich soil of the social communities and are adapted to social needs. Both the Islamic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have strong values and meaning of social existence, hence its theoretical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n the Turkish “Democratic Model”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Wang Lincong

pp. 20– 25

The Turkish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 with broad social foundation, has a strong Islamic background, but it is not of the Islamist party in nature. Since acting as the ruling party, the AKP has been carrying out moderate and practical policies— positioning itself as “democratic conservative party”; actively propelling democratization in Turkey and keeping balance between religion and common customs, striving to maintain the Islamic

cultural tradition and conventions and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slamic valu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t changing the secular nature of the state. The democratic model dominated by the AKP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Turkish political development road. Meanwhile, complicated and changing contests between the religious and the secular result in the connotative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is democratic model.